

江安文史资料选辑

第五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江安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会 编

644200

91

21.12

江安文史资料选辑

第五辑

贈閱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江安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九一年十月

封面题字：赖祥杰

封面设计：汪 庆

江 安 文 史 资 料 选 辑

第 五 辑

主管单位：政协江安县委员会

编印单位：江安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印 刷：江安县印刷厂

准 印 证：宜地文出（91）字第183号

一九九一年十月第一次印刷

（内部资料）

目 录

《留东新闻》在东京.....	常化知 (1)
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怀念许敬先同志.....	余时亮 (18)
川南红军游击纵队在连天山.....	闵 衡 (28)
陈岳安与“华阳书报流通处”.....	丁既明 (32)
国立剧专在四川的抗日救亡活动.....	康世明 (39)
江安的抗日救亡活动片断.....	肖能芳 (57)
曹禺在江安轶事.....	肖能芳 (63)
我从事柑桔事业的回忆.....	张文湘 (66)
张文湘与伏令夏橙.....	缪彤希 (68)
江安县银行始末.....	张树森 徐修芳 (90)
张铁僧先生早年工作片断	
——宁米济康概述.....	杨经纬 (95)
江安三青团始末.....	何述矩 (98)
自速其死的曹登朝.....	陈舜凉 (109)
漫谈江安八景.....	杨国荣 (116)
红桥磕粉猪儿耙.....	罗祝斋 (124)
征稿启事.....	(129)

《留东新闻》在东京

常 化 知

三十年代过来的人，谁都不会忘记中华民族在那屈辱艰苦岁月中的遭遇。1931年“九·一八”日本侵略军占领我东北地区后，进一步侵华。1933年“何梅协定”，为日本侵略军进一步控制整个冀察热打开道路，不久组成冀察政务委员会，实际上已脱离国民党中央的领导，成为日本控制的特殊化地区。1935年，日本侵略者扶持股汝耕成立冀东傀儡政府，由日本华北驻屯军直接控制。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者想进而征服全中国成为他们殖民地的野心已更加暴露。面对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我党和全国广大人民，要求抵御外侮，要求民主的高潮席卷全国。可是，丧权辱国的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不仅不抵御外来的侵略，反而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口号，加紧内战，向苏区连续发动五次围剿，企图把红军消灭。同时在蒋管区疯狂镇压广大人民要求抗日、要求民主的革命运动。在那暗无天日的日子里，“抗日有罪，卖国有赏”。先后有《生活杂志》负责人杜重远被判刑，抗日救亡会的七君子被捕等事件。在白色恐怖极为严重的情况下，不少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爱国进步人士被迫害屠杀；其中有些人遭到通缉追捕，有的在组织被破坏后无处容身，不得已暂时逃亡国外。也有不少有志青年，不满国内现实，暂时到国

外求学居住。日本离中国最近，生活费用比欧美低，往来也比较方便，又是多年来我国许多仁人志士聚居、谋求复兴中华的海外基地之一。因此，那个时期到日本的青年很多。据1936年初的不完全统计，仅东京一地就有八千人左右。在为数众多的青年中，绝大多数身居异域，却心怀祖国。尤其是那些被迫逃亡到日本的，曾经在国内参加过中国共产党、共产主义青年团和进步团体的青年，他们大多想在国外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为振兴中华民族，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奋斗。

1935年初，正在东京的四川籍留学生张健冬、傅襄漠（江安人）、简泰梁（富顺人）三人（他们在国内都参加过中共组织或进步团体，有的还被通缉），商量办一个时事新闻性的刊物。他们多方征求意见，特别是得到当时住在千叶的郭沫若同志的意见和支持，最后决定办一个周刊，定名为《留东新闻》。又经过很多周折，取得国民党大使馆驻东京的留学生监督处的同意，最后办理一切合法手续，取得日本东京警视厅主管部门的批准。刊物在1935年五、六月间正式出版。开始是八开四版每周一期，有时增刊两版到四版，定价五分。最高发行额达到三千多份。主要是在东京发行，很大部份是我们自己发卖，或者委托东京的一些进步团体发行。同时向国内几个主要大城市的报刊杂志、大专院校、图书馆等赠送并进行交换。刊物开办初期，社址是租用中华青年会馆的一间房子。地方很小，几个工作人员工作挤在一起，有的还住在社内。由于刊物发行数量少，定价低，即使发行到三千份以上，也只能勉强维持。开办的钱是简、张、傅三人节约费用支持

的。其中特别是简泰梁和晚些时候到《留东新闻》的他的弟弟简柏邨出的力量不小。前后在《留东新闻》工作过的几个人，都是没有任何报酬的，连吃饭的钱都是大家自己掏腰包。为了解决经费困难，郭沫若同志曾建议我们开一个四川饭馆。简泰梁曾为此回国一趟，在自贡找了一个厨师，1936年随简到东京，准备开餐馆。但几经申请，日本当局以留学生不能开饭馆为理由不予批准。这个计划不仅没有实现，而且又增加一个人在东京的生活费用。

我是1935年夏末到东京的，那时《留东新闻》已出版。因为在成都时我和张健冬就熟悉，共同参加过一些公开的群众活动，又是小同乡，我到东京后很快就参加了《留东新闻》的工作。那时除简、傅、张三人外，还有李仲平、张安国（江安人）也参加过一些具体工作。1936年简柏邨从国内到东京，也很快成为《留东新闻》的成员之一。同年傅褰漠、张安国回国后，刊物就只有五个人了。我们几个人什么都干，从编辑写作到编排、校对、发卖，大家动手。张健冬在应付对外联系花的时间精力不少，简泰梁在筹集经费出了很大的力。其余我们几人主要是搞内勤。我曾以“常情”的笔名编译并写过一些短篇和评论。

《留东新闻》是当时中国青年留学生在东京创办的唯一的时事新闻性刊物。三十年代是国家生死存亡之秋，是中日关系急剧变化的时代。三十年代的时事新闻，无一不涉及到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侵华的野心和暴行，不能不涉及到国内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不能不涉及到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对外屈辱、对内实行白色恐怖的罪行。除了这些政治上极其敏感的问题外，可以说就没有什么重大时

事新闻了。然而要在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心脏东京办一个时事新闻性的刊物，要争取长期存在下去，显然是极其困难的。不仅刊物会受到种种限制和迫害，随时都有“短命”的可能；连我们的人身直接受到迫害都是可以想见的。对此我们几个人有思想准备。从1935年创刊到1937年被查封的一年多中，我们无时不在很曲折复杂困难中和日本法西斯当局斗智斗法，承受各种迫害，一直坚持到最后。

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在三十年代已发展到登峰造极。1936年“二二六”事件，日本少壮派军人的发动侵略是一个明显的信号。为了对外发动侵略，他们的对内政策已更加走上军国主义化，对国内的控制已在加强。我们中国人在东京办时事新闻刊物，要适应这样的环境，困难就更大了。从《留东新闻》诞生到它夭折，不过一年多，它受到的迫害从头到尾没有停止过！首先是警方规定，每期出版前必须送审大样。他们经常对内容挑剔，故意找毛病，弄得我们非常紧张，不能按时发行。脱期是常事。开始警方规定：不让我们译载时事新闻，要交两千日元专案申请费后才能登载时事新闻。我们一直到第七期才勉强凑足两千日元的保证金，取得这种合法的权利。在我们的刊物上不时出现的反日抗日、揭露日本法西斯侵华的言论和资料，不断受到警方的警告和暗示。当时在东京的国民党极右分子对《留东新闻》的中伤也不后人，不过他们没有实权，除造谣外，他们起不到多大作用。日警方对我们的刁难与迫害花样是多种多样的。暗示、警告不起作用，他们就干脆查禁。第四十和第四十一期，除四十期发出一部份外，四十一期全部被没收。我们只好在四十二期登出申明：“因

内容不见谅于日当局而被禁止发行和没收。”以此表示抗议。有时我们也钻空子，把印好的先发出去，等他们查禁时我们已经发出，即使答应收回，实际上已不可能全部收回。我们就用这些办法和他们斗。日本的极右分子对我们的迫害是不择手段的。1936年11月7日《告知新闻》夕刊报道该社记者上海支局七日特电称：“上海抗日救国会策动日中交涉决裂，与东京各团体发行之《留东新闻》联络，报告日本之政治军事经济等情势消息于上海抗日救国会，该会以此等情报为基础，向国民政府作外交关系的进言。”显然是在制造迫害我们的借口。对他们这种有意进攻，如果不表态，他们就会认为我们默认和国内联系。

“策动日中邦交的决裂”，这个帽子可不小！如果表态，如何表又是一个极复杂的问题。我们不能非难上海抗日救国会的活动。我们便登了一个申明：对该社报道没有事实根据予以驳斥。并表明我社对日中关系从来是本着客观事实公平合理的报道。以此给以回击。

我们对日本法西斯分子公开侮辱中国人的言行，也进行过针锋相对的斗争。1936年1月31日第十八期和1936年²月7日第十九期上，就译载过日本人大谷光瑞公开侮辱中国人的文章。他说：“中华全国尽是匪类。”他还狂叫“在满洲若能杀上三十万匪贼，我看就可以了结了吧！”我们在介绍这个法西斯分子的原文后，写了一个编者申明：“侮辱中国人民至于此极！中华全国尽是匪类乎？本报以最大决心将它译出。光瑞都写得，我们读不得？中国当局为什么都哑然了？光瑞先生记着吧！中国人民永远不会有觉悟的一天了？”

日本法西斯当局除了用上述一些方法限制迫害我们的刊物外，还对我们进行人身威胁，我自己就遇到过这样几件事。都是东京警视厅的特务们干的。警视厅有一个特高课。其中有不少特高是专门对中国留学生进行监视的。有一个大家熟知的特高曾光顾我不少次。第一次到我的住处，问我承认满洲国吗？我干脆回答：不承认！紧接着追问我为什么不承认？我答：“因为我们的国家不承认，世界上的国家都不承认。”他碰钉子后也不再问下去了。有一次他到我的宿舍，看到我书架上放着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问我：“你喜欢这些书吗？”我立即从书架上把那本《共产党宣言》和一本《列宁选集》取下，把两本书的出版单位指给他看：“这是贵国出版社出版的，不是中国出版的。你们贵国政府既然批准可以出版，又允许书店出售，我们可以买吧？”他无言以对。当时在东京的一些左翼进步团体开会，有时在中国餐馆采取聚餐的形式活动，那位特高也不止一次光临，而且带一种预警式的口吻说：“你们又在聚餐了吧？”言外之意，可想而知。我从神保町搬到早稻田，又从早稻田搬到郊外去住。我并未通知邮局我新搬的地址，可是邮局却把信件转到了新搬的地址。为什么他们如此热心？后来老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告诉我：那是一种暗示，不管你搬到什么地方，他们都是知道的。表示我们这些人在特高的那里已经挂上号了。回忆我初到日本，在神户的东京的火车上曾经有一个日本人用中国话问我：“你是第一次来日本吧？”据说那也是特高的监视行动，从中国人踏上日本的国土起已经就有人注意了。以后在东京那些遭遇就不为奇了。

为了刊物的生存，我们在办刊中也摸索到一些对付日本法西斯的限制迫害的办法。除了少数的政治色彩的新闻和非政治性的文章，我们自己编写外，凡是国内外有关抗日反蒋消息，红军在国内外活动情况，我们都在消息前注明“同盟社讯”或者注明摘译自每日新闻、朝日新闻、中央公论、创造等刊物。而且注明材料登载的日期和刊物的页数。这样就有了法律依据，不是我们自己撰写的。我们巧妙地把许多报纸或几种杂志的文章材料搜集编在一起，就成了有系统的报道，甚至成了一篇有倾向的评论。用这种办法，用他们日本人自己的语言，把国内反日抗日的活动经常系统报道，而且在周刊上经常出现反日抗日这些词句，以达到我们的宣传目的。当时在国内国民党的报纸上是不准公开用“反日”两个字的。曾经有一个传说：一些日本商人为了赚钱，特意在火柴盒上印了反日口号，企图以此扩大宣传，迎合中国人的抗日心理，以推销产品。国民党有关当局检查到这些火柴后要加以没收，可是日本商人提出抗议，说是他们日本工厂的产品，国民党就不能不数行。在国内的报纸上常常出现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或者反对××帝国主义的××。广大人民群众都知道那两个××代表是什么。上海《生活杂志》的负责人杜重远，因为该刊发表了一幅漫画，讽刺日本天皇对外侵略，日本人正式向当时南京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说侮辱了他们的国家元首。国民党只好听命，判处杜重远的徒刑。这就是有名的杜重远事件。由此可见国民党政府丧权辱国到了何等地步！我们常常把日本人的报纸杂志上骂我们中国最恶毒的语言，把他们侵略中国的野心，系统地加以组编

发表，以激起广大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警惕和仇恨。我记得当时日本的一些有名的报纸杂志，如《创造》、《中央公证》、《东洋经济》、《钻石》和朝日新闻、每日新闻、同盟社等，经常主持召开一些座谈会，邀请有名的政治家，记者等座谈日本的对内对外政策，其中对华政策占很大的篇幅。在座谈会上的发言有各种不同的观点，大多数是为日本侵华制造借口，鼓吹大东亚共荣圈。鼓吹农业中国、工业日本以及日中并存共荣等谬论。座谈发言中有不少赤裸裸提出侵华的具体计划，步骤、目标等。还有公开侮辱中国的谬论，也有少数批评和揭露日本侵略野心的言论，也有同情中国的言论。这些言论对于了解日本的政策及其动向很有帮助，用他们的语言揭露他们很有力量。日本法西斯对我们这种揭露当然是不会默认为的，不止一次向我们发出警告。我们都据理力争，说明那些言论和资料都出自日文报刊，文责应他们自负，我们没有违反出版法的规定。日本法西斯对此也无可奈何。我们的刊物中，凡是引用满洲国、共匪、赤化、匪军等，我们都加上引号，改用“满洲国”、“共匪”、“匪军”、“赤化”等，我们的态度是很鲜明的。

在东京的刊物上揭露蒋介石和国民党丧权辱国，对内残酷镇压人民等等罪行，比在国内的条件好得多。这类问题，日本人一般是不管的，除非你指着鼻子骂他们和这些罪行有关。我们充分利用这方面的优势，大量揭露报道国民党内的丑行罪恶，全国人民要求民主的广泛斗争，要求抗日御侮的救亡运动，以及红军在各苏区的活动等。有几件重大事件的报道至今记忆犹新。一件是国民党在三十年

代大搞什么新生活运动，提倡忠孝仁爱信义和平。那时蒋经国还在苏联。1935年秋天，他写过一封骂蒋介石的信。蒋经国在信中大骂蒋介石不仁不爱，说他亲眼看见过蒋介石抓着他生母的头发，把她打倒在地，经常虐待他母亲，揭露蒋介石的假仁假义。还谈到他在苏联如何自己努力工作，过着幸福生活等。那封信在日本的《社会评论》上载出。同时我发现在《莫斯科新闻》（英文版，是莫斯科出版向国外发行的，总编是鲍罗庭）上也有一篇英文稿，经校译后以鸿生的名义译自《社会评论》，在《留东新闻》上发表（1935年11月第7期），大标题是：“蒋介石的不孝儿郎”，小标题是：“蒋经国从莫斯科致生父的一封大逆不道的信”。那封信的发表引起各方很大的震动。国民党在东京的爪牙们当然对我们恨之入骨，这也是他们想整我们的原因之一。

也是在1935年底，我们拆开从国内上海寄来的几份报纸中，意外地发现夹在中间的一份《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在此以前我们对国内这些重大变化了解是很少的。

“八一宣言”第一次提出停止内战和国民党共同抗战的主张，在党的战略上是有重要的意义的。怎样把这样一个重要文件登载出去，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正好在此以前，日本一个叫《极东》的杂志第一期也登载一篇文章，介绍中国共产党的国防政府纲领。我们把国防政府和“八一宣言”的内容组编在一起，详细介绍了“八一宣言”，使海内外关心当时中国共产党主张的人们有机会了解那个历史性文件的内容。1935年在北平发生的震撼全国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在东京也引起中日人士的震动。我们及时

在刊物上报道了这一振奋人心的事件。以“正阳门前新阵地，八千儿女血泪横”的醒目标题，详细报道了事件的如歌可泣的动人场面（1935年12月13日第11期）。以后我们又不断地连续报道全国大城市上海、天津、广州、南京等地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西安事变的消息我们最初是从广播中听到的。东京的报刊很快就详细报道这个惊天动地的事件，在当时留日青年中引起极大的震动，绝大多数人同声欢庆那个反共反人民的国民党头子的被捕。在东京的进步青年中也有不同的议论，争相估计蒋介石的前途。绝大多数人主张杀掉这个残酷镇压人民、对外屈膝求存的公敌。当然极少数国民党的爪牙及在东京的追随者却如丧考妣，大有树倒猢猻散之感！记得就在西安事变的第二天，当这个震惊中外的消息传遍东京的时候，我们一些人在一个中国餐馆的楼上，饮酒庆贺。就在这个餐馆的楼下一个单间内，我们看到也有几个人表情非常沉闷，面带泪痕走出大门。显然这是一小撮蒋介石的爪牙，为他们的主子被擒而饮酒消愁。那时我们遇到一些熟人时，大家都有同一感觉：现在在东京碰到中国人，八成可以从他们的面部表情看出他是左还是“右”。面对这一关系到中华民族前途的政治事件，我们想很快见报。可是如何表态却煞费苦心。日本报纸上众口同声谴责张杨的腔调，和我们的主观愿望在刊物上发表都是不行的。怎么办？大家商量的结果，以苏联塔斯社的口径为准，主要根据塔斯社的新闻发表消息，标题是：“张学良劫持蒋委员长”。把张杨通电的主张，要求停止内战，共同对外，在国内实行民主等内容一股脑儿的捅出来。但是，又把塔斯社批评张杨的行动

有利日本对华侵略等词句略而不谈。

那时我们在东京办刊物，由于没有国内党的直接及时的领导，对当时一些重大问题的报道和表态大都是以塔斯社的新闻和《莫斯科新闻》的倾向性为准的。但是引用塔斯社和《莫斯科新闻》的消息和资料，还得拐一个弯来避免日本新闻检查当局找麻烦。比如说：“同盟社据塔斯社电”等。这样一拐弯就把责任推在同盟社头上了。我们在国外的人，尤其关心红军的命运，日本的报刊杂志有关这方面的报道和评论不少。从他们发表的新闻中，可以看出红军在全国各地活动的情况以及国民党对红军的围剿的动向等。我们根据日本报刊杂志的新闻和资料，经常在刊物上发表这方面的消息。我们有意识地把一些消息分开或几次发表。但大体上保持一定的连续性。有心人一看便知，可以看出全国红军活动分布的地区，红军的力量，红军长征的路线，到陕北后的活动等等。尤其是红军到陕北后、双十二事变后中共的一些重要政治主张，我们都充分利用日本人的言论加以介绍。据国内来信反映，他们在《留东新闻》可以看到不少国内看不到的消息，听不到的言论。

1935年到1937年这一时期，在日本东京的进步青年出版了好几种文艺刊物，组织了不少左翼团体。这些进步团体和他们办的刊物，同我们有比较密切的联系。我们的刊物经常报道他们的一些公开的文艺活动、演出活动。我们的刊物也为他们提供阵地，经常发表他们写的文艺作品，为他们刊登广告等。我记得起的就有《东流》、《杂文》、《诗歌》、《戏剧艺术》、《现代文学》、《独立美术》、《世界动态》、《世界语》等杂志社，还有留东同学会、

留东妇女会、剧协等团体的活动。大约在十期以后，我们在第四版开辟了一个“文化线”专栏。在我最近查阅的十几期中，在“文化线”上写文章的就有已故的任白戈等，还有健在的陈辛仁等十余人。《留东新闻》在后期还专门为想在东京入学的留学生提供考学校的信息，向他们介绍招生学校的情况和入学考试前的准备事宜等。

如前述，《留东新闻》除在东京就地发行外，还大量寄回国内免费赠阅，进行交换。因此我们收到的国内刊物不少。如上海的《申报》、北平的《晨报》、《东方杂志》等都按时收到。以后还收到在巴黎办的《救国时报》。为了及时传播国内外的消息动向，为东京的中国留学生提供一个交往场地。1936年5月25日，我们在《留东新闻》社的楼下开办了一个报刊阅览室。陈列国内外四十几种主要报纸和杂志。经常到阅览室的中国青年很多。此外，我们还和东京的进步团体组织过一些活动。第一次是由东京的几个进步团体和我社发起，请郭沫若同志作学术讲演。郭当时住在东京近郊的千叶，日本人对他是注意的，暗中监视他的行动。在此以前他没在东京作过公开活动。经过时在东京的马相伯先生的敦请他答应了。报告会由马相伯先生主持，在中华青年馆举行。郭讲的题目是中日文化。到会的中国青年很多。会场气氛非常热烈。很多青年很仰慕郭沫若同志的为人，会场挤满了人群，热烈的掌声不时打断他的讲话。正在讲话中，少数在东京的国民党爪牙捣乱会场，向台上投掷苹果、梨子等物，竟然狂呼：“我们不要赤化宣传”、“打倒苏俄的走狗”等反动口号。一时会场大乱。郭沫若同志无法讲下去，便由我社和

几个进步团体的人叫车把他送回千叶。第二天我社的张健冬和他的妻子一块到他家慰问，他不在家。第三天收到郭的一封信，内容是：“昨日苏、张来舍未遇，谨此致谢！”并附他写的对联一副，表示他对那一小撮捣乱的极右分子的嘲笑。联文为：“妄把梨儿充炸弹，误将沫若作潘安！”（见1935年10月11日第7期《留东新闻》）

1936年11月4日我社和学联、剧协等共同发起召开鲁迅先生逝世的追悼会。日本著名左翼作家佐藤野夫也到会。郭沫若同志也前去参加。他送了一副对联，联文：“方悬四月，叠竖双星，东亚西欧同殒泪。饮颂二星，憾无一面，南天北天遍招魂”。郭在会上还讲了话。他用下面几句话赞扬鲁迅。他说中国人有赞扬孔子的几句话。“大哉孔子！孔子之前无孔子，孔子之后无孔子。呜呼孔子！”他说我把他改为：“大哉鲁迅！鲁迅之前无鲁迅，鲁迅之后无数鲁迅。呜呼鲁迅！”

《留东新闻》得到东京的左翼团体和许多进步青年的支持。这是它能勉强办下去的重要原因之一。他们除了给我们的刊物写文章，提供资料外，还给我们出主意，通情况，还帮助我们发行。对我们帮助最大最多的是郭沫若同志。创办刊物得到他的鼓励和支持。1935年暑期，我社的几个人到伊豆海边避暑，郭沫若和章伯钧二人也到伊豆。他们在那儿住了两个晚上。郭沫若同志和大家谈大革命时代的情况，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并指出新中国的光明前景，对我们几个人鼓舞很大。他走后的第二天，警视厅的特高就到我社几个人住的地方查问郭是否到过。大家佯装不知也就应付过去了。郭沫若同志除了应邀参加左翼进步